



中共贵州省委旧址大门。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薪火映黔山



筑光音乐研究会劳军演出告示。 中共贵州省委旧址纪念馆/供图

中共贵州省委旧址：

从秘密机关到“精神地标”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健 文/图

7月26日,改陈布展提升后的中共贵州省委旧址重新与观众见面,展陈内容、展览形式等方面焕然一新。中共贵州省委旧址位于贵阳市中心文笔街11号,这座青瓦灰墙的建筑曾是“高家花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代乾隆年间贵阳“高氏家族”的聚居之地。

1935年1月,红军长征的烽火照亮黔中大地,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委(简称“省工委”),这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中共党员、高家“言”字辈长子高言志,毅然将家中的藏书楼——怡怡楼和楼外楼提供给省工委,让“高家花园”成为贵州地下党秘密工作、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红色堡垒,点燃了贵州的革命星火。

红色印记：

历经三个阶段 斗争波澜壮阔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在贵州知识界得以传播。”中共贵州省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杨蔚介绍,早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贵州建立了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领导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1934年1月,中共毕节支部成立,林青任书记;7月,支部成员陆续转移到贵阳、安顺等地活动;9月,林青、邓止戈、秦天真、高言志等九人在“高家花园”召开秘密会议,组建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亦称“九人工委”。至1934年底,在全省建立了10余个党组织,发展党员40余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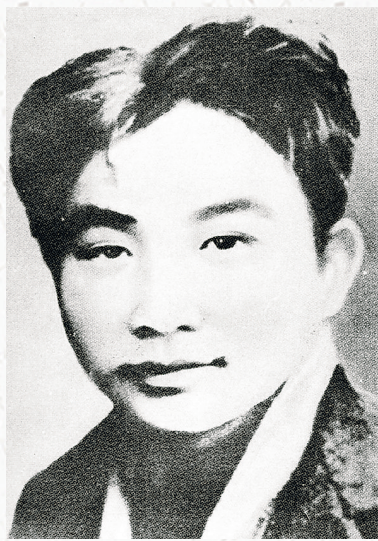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挺进黔北。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林青经过寻访,遇到了早年上海的同伴难友、时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吴亮平。经吴亮平引荐,林青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委,林青任书记,同时兼任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后因工作需要,增补刘茂隆为委员)。

“李维汉还向林青传达了党中央的有关精神,鼓励全体党员不畏艰难、顽强斗争。这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它使贵州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杨蔚说。

省工委建立后,根据中央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壮大进步力量,先后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凯里等地建立县委、县工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小组。此外,在省内部分县、乡建立了党支部。

党组织的蓬勃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1935年7月19日,国民党贵州当局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林青、刘茂隆等19人先后被捕,在贵阳的几个秘密联络点遭到严重破坏,史称“七一九”事件。

“看守林青和刘茂隆的狱警董亮清,曾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外地共产党员,想要帮助他们越狱,但一次只能救一人,也只有一次机会。他俩都争着将生的希望留给对方,争执之下,林青以上级身份命令刘茂隆服从组织



林青烈士像。
中共贵州省委旧址纪念馆/供图

安排,自己义无反顾地选择赴死。”杨蔚说。

9月11日,天空阴沉,气氛肃杀。林青被押赴刑场,他虽受拷打、体力不支,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敌人为了堵其口,竟用短刀横卡其嘴,刀刃切入面颊,血流不止。林青强忍剧痛艰难呼号,终遭枪杀,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之后,省工委停止活动,但其领导下的一些组织及地下党员仍坚持进行革命斗争。1937年9月,中央特派员黄大陆从延安回到贵阳,与在贵阳坚持工作的李策着手重建省工委。翌年2月,新的中共贵州省委成立,由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为委员。

在重建后的省工委领导下,全省党的组织得到了较大发展。1938年至1941年,在贵阳、遵义、安顺、毕节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组织,并直接领导凯里、平越(今福泉市)等地的党支部或党小组。

由于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为有效保护革命力量,按照中央指示,决定对贵州党组织紧急疏散,1940年4月撤销省工委,组建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临工委”),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已暴露的党员骨干进行转移,调整各级领导班子。1943年7月,疏散工作结束,省临工委停止活动,但在各地隐蔽下来的党组织和一些党员仍继续坚持革命活动,直到抗战胜利。

1947年底,中共黔北工委建立,受川东地下党领导,负责组织协调贵州地下党的工作。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再度组建中共贵州省委,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1949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黔东防线;11月15日,省城贵阳解放,至12月底,贵州全境基本解放。

卓著功勋：

支援红军长征 领导抗日救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阔画卷中,省工委以坚定的信仰与卓越的智慧,在黔中大地书写了支援红军长征、领导抗日救亡、推动贵州解放的光辉篇章。

1935年2月,中央特派员潘汉年抵达贵阳,与省工委委员秦天真秘密接头,听取工作汇报,传达中央指示,开启了省工委配合红军战略行动的序幕。

在省工委的缜密安排下,成功获取了国民党贵州军事详图、密码及地空识别标志,并及时秘密转送至前线,为红军在黔转战提供重要情报支撑。四渡赤水战役期间,省工委利用各种机会牵制国民党军队的行动。1935年4月,遵照中央指示,省工委组建的军事小组活跃于安顺、黔东南,积极开展兵运、游击武装斗争等工作,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军队,为红军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白色恐怖中,为安全护送潘汉年前往上海,以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省工委委派共产党员、贵州妇女运动的先驱蓝运斌负责护送工作。“为应对国民党严密盘查,两人假扮夫妻,对外宣称‘前往北平读书’,从贵阳经独山、柳州取道广州、香港,最终安全抵达上海。”杨蔚介绍,蓝运斌“始终保持从容镇定,言谈举止毫无破绽”,潘汉年事后评价其“为任务成功发挥关键作用”。

省工委的重建以及基层党组织、党员的扩大,有力促进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成为团结全省人民的中坚力量。

在文化抗战前线,1936年12月,骆驼话剧社在贵阳组建,以艺术为武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4月,“筑光音乐研究会”在贵阳成立。随着贵州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

省工委根据这一形势,选派了一些党员和进步学生参加“筑光音乐研究会”,并建立了中共筑光党支部,将“筑光”由一个从事音乐活动的组织,转变为抗日救亡文艺团体。

1937年7月,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秘密创办《贵州学联》刊物,掀起青年抗日热潮。次年,经《新华日报》总社同意,省工委建立了《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指派中共党员到分销处工作,进一步巩固抗日宣传阵地。

1938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构建起连接大后方与延安的重要纽带。省工委协助寻找办公地点,协助交通站运输物资、开展统战工作等。

1938年夏,在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指示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党支部在长沙成立。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及相关机构迁至贵阳图云关,成为全国抗战救护体系的“心脏”。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省工委始终英勇无畏、坚持斗争,广泛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在各行各业中建起党支部、党小组和党的外围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力量,将革命火种播撒在黔中大地,助力贵州、贵阳胜利解放。

时代新声：

宣传形式出新 赓续红色基因

1982年,中共贵州省委旧址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



讲解员杨蔚在介绍省工委的建立过程。



筑光音乐研究会部分会员合影。 中共贵州省委旧址纪念馆/供图